

从习近平文化思想看“书像”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董秋雨*

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书像”研究，具有重要的引领与指导意义。面对当代“语—图”危机，“书像”具有特定的优长。其不仅是主体身份的“独特标识”，更反映出对于个性精神的“深沉追求”，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意义。“书像”研究应以坚定“文化自信”为前提，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同时重视跨文化视野下“开放互鉴”的价值。加强学理深度，避免引发“虚无主义”的危机，并保持对时代转型中“创新形式”的审慎和关注，应是“书像”研究始终坚持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书像；研究前景；发展方向

Prospects and Directions of "Calligraphic Image"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Dong Qiuyu*

Abstract: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holds significant guiding and directive value for the study of "calligraphic image". In the face of the contemporary "language-image" crisis, calligraphic image possesses distinct advantages. It serves not merely as a "unique marker" of subjective identity, but also reflects a "profound pursuit" of individual spirit, thereby manifesting strong practical relevance. Research on calligraphic image should proceed from a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cultural confidence", striving to construct a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le concurrently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open mutual learning" within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Enhancing theoretical depth to avert the crisis of "nihilism", and maintaining both prudence and attentiveness toward "innovative forms" amid epochal transformations, ought to constitute the enduring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that calligraphic image research consistently upholds.

Keywords: Xi Jinping's cultural thought; calligraphic image; research prospects; direction of development

版权 © 2026 归作者及香港致源出版有限公司所有。

本刊遵循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 (CC BY - NC 4.0) 开放获取。

详情请参阅：<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董秋雨（1993—），男，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文艺对于社会的反映，并非依托于抽象的概念，而是需要通过“文字、颜色、声音、情感、情节、画面、图像”等渠道，完成“艺术再现”^[1]。习近平总书记曾将汉字的存在，评价为“非常了不起”，指出其对于维系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2]。习近平总书记将书法视为“中华文化瑰宝”，认为其中包含着“精气神”，一定要做好“传承”与“发扬”^[3]。以汉字为载体，书写为手段生成的“书像”，是一种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符号。其突破了对外物单纯的形像仿拟，呈示为基于“语象”激活与映射的“书写比象”^[4]，体现出与所属文本紧密关联，而又对其有所超越的性质，包蕴着相当丰富的层次和深厚的内涵。“书像”在辅弼“语象”进行表意的同时，也凝结着书写者独特的气质与深刻的思想。

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鲜明品格”^[5]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新时代文艺研究有着重要的引领与指导作用。近年来，立足与对应“语象”“字像”之间紧密、复杂且微妙的联系^[6]，“书像”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概念，越发受到学界关注。^①通过对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相关理念的分析，可探寻“书像”研究的前景与方向。

一、“独特标识”与“深沉追求”：“书像”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代社会的信息传播与接受方式，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媒介技术的发展与革新，在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埋藏着特定的危机。直面“信息革命”引发的挑战，新时代的“书像”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读图”的旋涡：对阅读方式的审视

经过二十世纪的演变，“语一图”分体的进程愈发深入，图像因更强的识读便捷性、视觉刺激性，以及更易为普罗大众所悦纳的内容娱乐性等，逐渐取代语言，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流方式，二十一世纪由此逐

步迈入“图像时代”。

随着现代图像对于语言文本的疏离，加之各式新媒介的多次复制、转译，以及轻率、浮靡之风的浸染与侵扰，其对于意义的承载和表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失准、失实、失范等弊病。感官接受层面，“观看”有着相对于“言语”的“居先性”^[7]。在快餐文化、消费主义盛行的后工业化社会，民众对信息的获取，容易陷入耽于图像接受的“虚拟仿像”泥淖，漠视甚至遗忘语言表述所具有无法替代的“实指”价值。经典文本自身的思想性与崇高性，也会在图像符号的“越位”中，发生不同程度的弱化。因对于形式更加“精致”的图像载体的习惯性接受，人们渐而疏远了相对“朴素”的语言。由此带来的，不仅是对文本理解真实性、全面性与深刻性的忽视，更是语言感知力与审美感受力的钝化^[8]。同时，对随处可见、瞬息万变的图像的过分依赖甚至沉溺，使艺术原有的“氛围”^[9]日趋消解，进而引发审美贫困与精神疲乏。具有鲜明“现代性”的图像，尽管提供了充足的审美对象，带来了强烈的感官愉悦，却因呈现出“过渡、短暂与偶然”^[10]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审美的浅俗与异化。“审美茧房”^[11]效应由此而生。在现代社会，人们仍需找到“诗意栖居”的合理方式，不致因审美能力的丧失，在观照自然与社会时，落入“仅仅从外在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12]的窠臼。

习近平总书记认为“和”观念是中国传统思想精神的核心，由此发展出的“和”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13]。图像与语象之间、表意与接受之间的“失和”，显然不利于思想与文明的承续。由此可能引发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失调”，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明确要求相抵牾^[14]。文艺须直面的“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1]，不应仅作为表现对象，更应以此为问题来源，从而促发进一步的行动。我们需对当下愈演愈烈的“读图”风潮进行冷静审视，思考如何在语言、文字与图像读取之间把握合理的平衡，重塑大众作为意义接受者，其感官功能的统整与完善。由书写而成的文字文本，实际组建了“异质同构”的格

式塔,“书像”与“字像”“语象”之间,产生了互文、共生的“图—底”关系^[15]。“书像”作为外显的“图”,除了对作为“底”的“字像”与“语象”的视觉呈现,还有意义补充、拓展,以及审美增殖等作用。落实于“书像”的传统信息交流方式,仍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二)“书像”的优长:对表意形式的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曾将中华文化的性质归纳为中华民族精神“最深沉的追求”“最根本的基因”“最独特的标识”。文化由内而外塑造了精神的内核与形式,所提供的“丰厚滋养”,成为其发展与显扬的不竭动力^[16]。书法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与内涵的艺术形式,在承载语言文字的表意功用之外,也凝结着书写者真切且深刻的精神气质。“书像”作为图像的一种特殊形式,在“语象”阐释方面,具有单纯“字像”所无法替代的功用。其既是个人身份的“独特标识”,也反映出个性精神的“深沉追求”。对“书像”的关注与研究,在机械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具有重要意义。

就文字传播而言,从诉诸油墨印刷的纸质阅读,到呈现于设备屏幕的电子阅读,公共性质的信息摄取,无不体现着规范性与标准性。源自“统一”带来的便捷,这样的方式保证了信息生产与交流的效率,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填补了图像传播可能造成的表意错漏或异化。然而,单纯的“字像”同样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即难以充分发挥“书像”在情志表达上的丰富性,以及艺术表现上的生动性。以书法进行表意的文字符号中,“书像”作为特殊“符形”与“伴随性文本”,是真实“符义”在形式层面的衍生和延展。这也是我们从手写文字的阅读与书法作品的观赏中,更易获得真挚的情感体验、精神共鸣与审美享受的主要原因。透过具备“书像”特质的文本进行互动,更容易达到“相互理解,沟通心灵”^[17]的表意效果。

由于科技的发展与信息化传播需求的日益增长,传统书写方式正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机械化生产”成为当前文艺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和问题。^[17]以特定输

入法或规定程序生成的文字,对于意义的完整传达,全然依凭“字义”链条所构建的“语义”逻辑,有赖于读者自身具备较强的语义分析能力。

后工业文明时代充斥着的“信息化”与“技术性”,“似乎正向着‘摆脱’感觉、视觉和听觉的方向发展”,甚至可能“取代我们自己的感觉活动”^[18]。应当正视的是,相较于信息时代的输出方式,以实体化纸笔工具进行的现实书写,依然有着特殊的价值。对书写者而言,无论出于客观记录还是主观表达的需要,书写行为可使多种感官与知觉,得到更加全面的激活和调动,从而有更为充足的准备,对书写内容进行相对深刻的理解与体悟。在此过程中,书写者可对自身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更加完善的转化与示现。对于接受者(阅读者、观看者)而言,可从个性化的“书像”中,感知到语义与字义之外的“书意”真实,领会到书写者(也可能是直接的叙述者)隐匿于文本内容之后的情感态度或精神指向。传统书写的表意形式,为非公共性的交流与沟通,保留了人性的特点和温度。由此写就具有自由性和艺术性的“书像”,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视觉观感的审美需求。

二、“坚定自信”与“开放互鉴”:“书像”研究的主要立场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文艺研究,提出了极具现实性与建设性的期望,确立了总体目标与整体设想。在此背景下,担负着特殊使命的“书像”研究,理应坚守特定的立场。

(一)“自信”的基础:对本土话语的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性,认为其是另外三个“自信”得以实现的基础与根本。对于“文化自信”的坚定与弘扬,是习近平总书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论述的前提与底色。文化自信是得以“充分肯定”与“积极践行”民族、国家与政党自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与保障,可进一步表

现为对于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心^[19]。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命脉”，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0]。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厚的内涵与旺盛的生命力。“书像”聚焦通过书写表现的语言和文字，所包含的书法、汉语与汉字，均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肥沃土壤。其生成与发展，体现着中华文明的特色与底蕴。同时，鉴于该论域的特殊性，对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西方话语”主导的现象，应更为审慎地看待。不加辨析、甄别，直接挪用西方相关术语或理论，并非科学、合理的研究态度与手段，极易导致研究过程的生硬，以及结果的偏颇乃至谬误。对“书像”基本原理与重要概念的阐释，应主要依托于本土文艺理论资源。对典型案例的具体分析，也需放置到相应的中华历史文化背景中，深入发掘其中隐含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自信”的夯实，有赖于“文化主体性”的建立，以及所引发文化意义上自我的确证与坚定^[21]。“书像”相关研究成果的迭现，是“文化主体性”的敏锐发觉与深入推进，是新时代文艺研究领域“文化自信”的突出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的强调，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为“书像”研究提供了立场的认可与前进的底气。

（二）“互鉴”的价值：对宏阔视野的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出，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应具有“多彩”“平等”“包容”的特征，只有加强“交流互鉴”，才不至于“孤芳自赏”。保持文化自信的前提条件，是避免陷入“文化保守”与“文化自大”的泥淖^[22]。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语—图”危机，研究者应当以“开放”的胸怀，积极践行“互鉴”的举措。“书像”虽然发源于中华文明，对其的探讨也不可完全拒斥“比较”研究范式，应尝试拓展出宏阔的“跨文化”视野。

早在晚清民初，以梁启超、苏曼殊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已开始“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探索，后经

朱光潜、钱钟书等的着力推动，当代乐黛云、曹顺庆、张沛、张隆溪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与体系建构，“比较文学”已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分支，旨在跨越国家、民族与文化、语言的界限，以更为宏阔的国际视野，探索文学和人类文化发展的本质规律。其价值与意义早已得到学界公认。近年来，在比较文学方法与理路的影响下，“比较艺术学”也已逐步发展成型，产出不少颇具影响的研究成果，渐而成为艺术学研究领域的重点与热点。

通过对“书像”研究现状的整体观照，不难发现，绝少以跨文化视野，围绕中外“语言”“文字”与“书写”的关系，进行横、纵向交叉、深入比较的成果，已有的基本为从宏观层面作出的简要判断或议论。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与文化性质，乃至书写所用工具、媒材等，均有明显差异。然而，“书写”行为的生成方式与“书像”示现的根本目的，却存在通约性与可比性。基于表意符号之间的共性，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彰显出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可以肯定，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书像”研究，是一条值得探索、大有可为的路径。

针对“书像”进行具体分析时，一方面，应警惕中西文化的分野，避免对西方话语不加甄别地直接挪用；另一方面，鉴于以语言、文字为“底”的书写符号，在指称、象征等作用上的共性，不应完全忽略“跨文化”的整体视野。通过科学、合理的比较，可更清晰地认知研究对象的本质和特色，也可获得对相关原理更全面、深刻的理解。

三、“避免虚无”与“兼顾时新”：“书像”研究的发展方向

新时代“书像”研究，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和相应的突破。作为一个具有交叉性、时代性的新兴论域，“书像”研究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下，持续探索符合自身需求与特色的发展方向。

（一）“虚无”的脱离：对学理研究的加强

习近平总书记曾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虚无主义”^[22]，指出应当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进行“全面深入”^{[21]5}的了解。然而，受学科划分带来的视域偏狭影响，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相关概念与问题的阐释，容易陷入“浅表”的困境。上升到对文明史或文化史的理解，则多是单线、孤立的，存在进一步诱发“空泛”“虚无”的可能。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需要我们以统整的视角，综合多学科的内容与方法，对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进行全面、深入的探析。

统观现有关于“书像”的研究，不难发现这样的问题：对于“书像”产生的动因、原理，以及演变脉络的探讨，仍存在较大的空间。相关理论分析，多围绕着“书者，如也”“书，心画也”等宏观“公理”。然而，这些观点的讨论重心，大体集中在“书像”对创作者修养、情感的反映，以及结合“字像”特点，对外物进行的审美仿拟。“语意”与“书意”究竟如何发生关联？这样的关联具体以何种样式反映在“书像”上？字体、书体的变化，以及一些呈现于“书像”的个性化表现，分别透射着何种意义或趣味的表达？……诸如此类问题，都应持续进行剖析与深化。赵宪章曾对中国文学图像关系史中的“一体”“分体”与“合体”现象，进行了科学、系统的梳理与总结^[23]。“书像”作为与文学关联更加紧密的“图像”形式，是否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在文学与图像关系主体脉络的基础上，审视文学与“书像”关系内在、微观的变化，是学界应进一步关注的问题。同时，还应注意文学与书法关系的嬗变，对于不同文学或书法类型发展的“反作用”，即来自“关联”的影响如何反向渗透到本体，所引发形式与内涵的变化，又如何促使“关联”产生后续演变。

“书像”的生成与发展，无法剥离政治、经济等社会层面的影响。“语象”“字像”与“书像”之间的有机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透射着对应时代的相关特点与规律。已有围绕“书像”的研究，更多地停留于

文化角度，对背后隐含的来自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或考虑不周，或探讨不够。对中国语言、文字与书写形态特征、运行法则等的理论总结，当前研究仍有一定的深度欠缺。

“书像”研究有别于“书法”研究。因“思想和价值观念”是文艺灵魂所在^[1]，应将文学与书法所包含、延异的形式、现象和行为，从意象生发的源头上，看作具有内在逻辑的集群，透过“书像”与背后的文学文本，探掘创作者真实、深刻的情感与思想，以及来自时代、社会的多方面影响。“书像”的个案研究，也应有开阔的格局与整体的眼光。相关论析应从对个体的解读出发，充分落实到推进共性问题解决的层面。这样的探索模式，方可体现出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引向深入”^[24]的宗旨，不致落入“虚无主义”的窠臼。

（二）“创新”的意义：对时代转型的关注

无论时空的变化与差异，文艺都遵循着“与时代同频共振”^[1]的规律。面对新时代层出不穷的“新的文艺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到当前“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的缺乏，提出了“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的要求^[17]。书法的传统面貌，与不断生成的“新形态”之间的摩擦乃至碰撞，是“书像”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传统文化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重点，在于转化的“创造性”与发展的“创新性”^[25]。创造性转化的重点，在于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从而“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在于按照时代进步与发展的新要求，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进行“补充、拓展、完善”，从而“增强其影响力与感召力”^{[16]203}。“以文化人”^[26]的时代任务，方可得到持续跟进和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明创新性所决定的进取精神，有着“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精准概括，提出应当“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努力创造属于新时代的“新文化”^[27]。这对于当前“书像”研究普遍存在的“厚古薄今”“固步自封”之弊，有

着显著的指正意义。大部分相关成果涉及的时间范围，集中在先秦到二十世纪末。对于新世纪以来新现象、新问题的聚焦与探讨，呈现出正视不足，数量不多，深度不够的状况。已知少量的针对性研究，以意义讨论与价值研判为重点，并未切实阐明“创新”面貌的成因与实质，以及所暗含时代文化转型的重要规律。试分析其原因，应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与“书像”相关的理论主要来自古代，与之关联的创作者和作品也分布在相应的历史时期，无论规律探赜还是个案分析，都具有充足的论据与例证，研究基础也较为扎实。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书像”，在传统文学遭遇“危机”，日常书写逐渐“失落”的时代背景中，难以寻绎可供依托的理论话语，在学理分析上具有相当的难度。

第二，二十一世纪的文学与书法，在剧烈的变革中，不断发生着形式与功能的转型，未能维持相对稳定的面貌。“网络文学”“影像文学”“声音文学”等新文学形式的流行，引发了主流传播媒介的变革。“吼书”“盲书”“乱书”“射书”等颇具争议的新“书像”类型不断涌现、兴起，对传统书法形成了较大幅度的冲击。随着文学与书法在形式上的日渐疏离，“书像”原先承载的叙事、抒情、审美等功能，也开始显得模糊与含混，为研究带来了较大困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优秀文艺作品应具备“文质兼美”的性质^[28]。此原则可成为判断“新书像”在“创新”的同时是否“守正”的重要标准。大胆创新的同时，应当极力规避“浮躁”这一当前文艺最为突出的问题^[17]。无论外在形式如何变化，都应“反映生活的本质”“提炼生活蕴含的真善美”，给予接受者“审美的享受”“思想的启迪”或“心灵的震撼”^[1]。尽管“当代书像”的价值与定位，有待历史的检验与评价，然而必须承认，其是二十一世纪文化的鲜活表征，是对传统文化当下“时代内涵”与“表达形式”^{[16][203]}的生动反映。对于二十一世纪新样态的关注，应是“书像”研究不可忽视的方向。

结语

“书像”由“语象”与“图像”两种表意符号共同熔铸，其生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语”“图”作为异质符号的天然“间性”，促成了二者的互融与重构，创设了“语图无间性”^[29]，为“语—图”表意系统的形态建构增添了多元性。在二十世纪文学与图像的“分体”过程中，“书像”实际成为“语象”与“图像”之间的关键介质和桥梁，使该变革的发生与演进更加丰富且深彻，也为面对二十一世纪“图像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与可能。

注释：

①赵宪章从“文学图像”出发，基于文学与书法之间更加紧密、丰富的关联，拓展出“文学书像”这一学术概念。关于“文学书像”的学理意义和价值，已有多篇发表于重要学术刊物的论文进行探讨。2023年5月，“文学书像论与书法美学创新”学术研讨会于山东济南成功举办，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来自文学和书法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开始重视“文学书像”这一极具学理深度与创新意义的跨学科论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1(2).
- [2] 刘灿辉. 发掘书法资源的时代价值[N]. 人民日报, 2023-02-14(13).
- [3] 许有云. 开展书法教育, 感悟文化之美(师说)[N]. 人民日报, 2021-10-17(5).
- [4] 赵宪章. “文学书像论”的理由[J]. 当代文坛, 2023(6): 20.
- [5] 人民日报评论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 论贯彻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N]. 人民日报, 2023-10-11(1).
- [6] 赵宪章. 文学书像论: 语言艺术与书写艺术的图像关系[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36(2): 83.
- [7] 约翰·伯格. 观看之道[M]. 戴行钺,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
- [8] 齐奥尔格·西美尔. 时尚的哲学[M]. 费勇, 吴蕾,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197.
- [9] 瓦尔特·本雅明. 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经验与贫乏. 王炳均, 杨劲,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9: 264.
- [10] 夏尔·波德莱尔. 现代生活的画家[M]//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

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85.

[11] 傅守祥,邵叶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艺实践与审美引导[J].浙江社会科学,2023(10):128.

[1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7-88.

[13] 习近平.在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16(2).

[14]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2.

[15] 赵宪章.“文学书像论”的理由[J].当代文坛,2023(6):23.

[16]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99-100.

[17]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10-15(2).

[18] F·贝尔.听和听见[M]//R·舍普.技术帝国.刘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09-110.

[19] 习近平.文化自信 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EB/OL].央广网,(2016-08-05).https://news.cnr.cn/native/gd/20160805/t20160805_522891359.shtml.

[20]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28(3).

[2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

[2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2).

[23] 赵宪章.文学和图像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江海学刊,2010(1):187.

[24]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2022-05-29(1).

[25] 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2-26(1).

[2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13.

[27]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28]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12-15(2).

[29] 赵宪章.文学书像论四题[J].美术大观,2023(4):124.